

从语言符号学到翻译符号学 ——王铭玉教授访谈录

王铭玉¹ 任伟²

(1.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 2.四川师范大学基础教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当前,翻译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语言符号学也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在此背景下,长期致力于语言符号学研究的王铭玉教授大力倡导翻译符号学。翻译符号学与语言符号学有何关系?翻译符号学对语言符号学和翻译学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王铭玉教授在访谈中,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了解读和阐释。同时,文章在分析国内外翻译符号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规划了翻译符号学所面临的任务,为构建翻译符号学学科指明了努力方向。

关键词:翻译学;语言符号学;翻译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H1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17)05-0025-06

DOI:10.13978/j.cnki.wyyj.2017.05.006

王铭玉教授是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高端智库(中央文献翻译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方向)核心团队成员,2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王教授兼任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在语言符号学、普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外语教学论等领域成果丰硕,尤其是对语言符号学的研究居于国内前沿地位。由他撰著的《语言符号学》和《现代语言符号学》已经成为国内符号学研习者案头必备的参考。

近年来,王教授积极倡导推进国内翻译符号学的发展。一个研究语言符号学的学者为什么要关注翻译符号学?翻译符号学对翻译学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当前国内翻译符号学发展现状如何,未来突破的方向何在?本文在系统梳理符号学、语言学、语言符号学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对语言符号学和翻译符号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供语言学、符号学、翻译学领域的同仁参考。

任伟(以下简称任):王老师好,感谢您接受采访。我注意到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符号学,尤其是语言符号学。所以我首先想请教您的是,符号学、语言学以及语言符号学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

王铭玉(以下简称王):简单说,符号学就是研究符号的科学。更具体地讲,“符号学是系统地研究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学问。”(哈特曼 1981:311)符号学是一门诞生于20世纪初的新兴学科。现代符号学思想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 de F.),他对符号学的理解偏重于符号的社会功能,用的术语是“semiology”;另一个是美国逻辑学家皮尔斯(C. S. Peirce),他偏重于符号的逻辑功

能,用的术语是“semiotics”。可以说,他们几乎于同一时期提出了“符号的科学”这一概念,被视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王铭玉 2004:2)。

谈论语言符号学,首先要涉及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关系问题。对此,学界看法也不一致。总体说来有3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另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从属于语言学。介于二者之间的观点则认为语言学和符号学是两个独立学科,各有其独立的研究范围。

我们倾向于折中,因为虽然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可以归作符号的下位概念,但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它并不仅仅研究语言符号本身,还要研究语言的普遍性质和规律,所以它和符号学是并行的,二者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独立”是针对各自的“完整性”而言的,它并不排斥两门学科的“结缘”,恰恰相反,它们彼此合理的交叉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发挥综合学科的优势(同上:7)。

而语言符号学是一门交叉科学,它之所以能把语言学与符号学跨接起来,主要在于二者的自然联系。一方面,源自索绪尔的欧洲符号学传统一直强调语言学对符号学的影响。比如,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担当着其他符号系统解释者的角色。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 L.)认为,语言是一种能够翻译它以外的一切符号体系的符号体系;雅各布森(Jakobson, R.)也强调语言在符号系统中的中心地位;俄罗斯符号学界的传统看法是将语言符号视为第一模式系统。另一方面,符号学作为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对语言学也施加着毋庸置疑的影响。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价值观、结构观等思想均源自其将语言

视为一种符号系统这一理论出发点；莫里斯(C.W. Morris)对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符号学三部门的划分彻底改变了语言学传统问题的研究视角；符号学跨学科的本质特点促进了语言同人类生活其他现象的比较研究。符号学为语言学者将其他知识领域的素材，特别是民族学、文学、考古学等与文化相关的材料纳入研究的跨学科态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由此看来，语言学 and 符号学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互动和互融的基础早已存在，二者的结合不仅是可行的，同时也是理想的选择。既可以使符号学“触地”，又可以使语言学“升天”(同上：8)。

语言符号学是研究语言符号以及用符号学的思想观点来研究语言学的学科，从学科归属来看，它是符号学的下位概念。我们知道，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被普遍定义为对语言的一种科学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而语言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有二：一是把语言当作一种特殊的符号来研究，二是用符号学的思想来探究语言学本身。

任：谢谢王老师，通过您深入浅出的介绍，我们对符号学、语言学与语言符号学的区别与联系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近年来，王老师积极倡导推进国内翻译符号学的发展。您所倡导的翻译符号学与您主要从事的语言符号学研究是怎样一种关系？研究翻译符号学对语言符号学以及符号学有怎样的意义呢？

王：语言符号学研究是我的主业，但在出版了《语言符号学》和《现代语言符号学》两本专著之后，我发现语言符号学的研究要深入，还要在扩展“语言符号”上下功夫。必须将文字符号、广告符号，尤其是涉及符号转换的翻译学纳入视野。语言符号为狭义符号家族的典型成员，也是语言符号学的重点关注范畴。而研究语言符号学，很难绕过不同时期、文化区域和地域之间的表意符号互动这一现象，即同一语言符号范畴内不同时期之间的转换(语内翻译)，以及不同语言符号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之间的转换(语际翻译，即翻译界学者通常的研究对象，现在一般理解为狭义翻译)(贾洪伟 2016：91)。于是，在经过共同探索之后，我和贾洪伟博士等人在各种场合发表文章，倡导建立翻译符号学学科。

翻译符号学也是一门交叉学科，它和语言符号学同属符号学下位学科，二者关系紧密。

翻译符号学与语言符号学一样，同样使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不同的是翻译符号学是符号学与翻译过程的结合，研究符号或符码的转换问题，旨在建构以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的符号学分支学科理论

体系，而语言符号学系符号学与语言学的联姻，研究的是语言符号本身以及用符号学的思想观点来研究语言学问题。

语言符号学在我国的成功建构代表着符号学的重要发展方向，是符号学与语言学内在发展的必然诉求，极大地推进了语言学作为一门领先科学的发展。语言符号学目前已经建构了比较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研究理论，对语言的层级本体进行了研究，如语素符号层、词汇符号层、句子符号层、篇章符号层等。语言符号学把语言作为符号，即把“语言符号”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因为语言符号是所有符号中最复杂、最典型、最完善的系统，是所有其他符号系统的母版。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语言符号系统视为元符号系统。

翻译符号学目前处于萌发阶段，与语言符号学一样归属于符号学，但是翻译符号学的核心是研究符号转换过程，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符号系统的转换。因此，有理由认为，语言符号学理论与翻译符号学学科建构会有极大的关联，甚至可以在其中发挥基础和支柱的作用。由此来看，研究翻译符号学首先可以推进对语言符号转换问题的研究，同时将视阈延展至非语言符号之间，以及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问题；前者可以算作是对语言符号学的推进，后者属于新开辟的符号学应用领域，这对于中国符号学的本土化以及普通符号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都具有推进作用。

任：王老师，目前在国内外翻译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从事翻译研究者众多，研究经历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目前颇有影响的还有生态翻译学，以及对语料库技术的运用等等，研究路径方法可谓丰富多样。您觉得翻译符号学可以给翻译研究带来些什么呢？

王：翻译学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一门开放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诸多学科的影响。毋庸置疑，各种理论、流派、路径、方法等都曾为翻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使翻译学的跨学科性质愈加凸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传统的翻译概念需要进一步厘清，建构宏观翻译理论(尤其是宏观方法论)的必要性也被更多的人提及。我们之所以倡导建立翻译符号学就是想在此方面做些尝试，与大家共同讨论和探索。

我认为，翻译符号学的理论观点会给翻译研究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和重要的补充。

(1)翻译符号学的外延观。研究对象的扩大是翻译符号学与一般翻译研究最大的区别，它体现了符

号学的本质特征。翻译符号学涉及的是广义的符号和翻译概念,不但囊括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即有形符号之语言符号的内部以及之间的转换,还包括有形符号之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更包括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①之间的相互转换,这是此前翻译学所未予关注的,也是翻译符号学对翻译学在术语指称范围和翻译类型层面所做出的拓展和贡献。翻译符号学是以符指无限延展、阐释不断进行为出发点的,故而打破了传统上的作者-译者、原作-译作、忠实与不忠、等值与不等值、等效与不等效等二元对立的藩篱,崇尚的是符号转换的多元互补观念,将文化一元观、语言符号学二元观和普通符号三元观融为一体。

(2)翻译符号学的内涵观。一般的翻译研究主要包括文本与语言、翻译的标准、双语转换规律与规则、译者身份与地位、翻译批评、翻译史等,而翻译符号学的研究更多地归于本质性和学理性研究,它关注承载信息符号的本质与类别、符号转换的潜势、本质、过程、规律、策略,其核心学科内涵为翻译中的符号或符码转换,具体体现为符号过程与翻译、符号行为与翻译、符号关系与翻译、符号层级与翻译、符号间性与翻译、符号守恒与翻译、符号功能与翻译等层面(王铭玉 2015:1)。

(3)翻译符号学的关系观。一般的翻译研究主要探究翻译现象及其相关的参数,而翻译符号学要把与翻译相关的各种意旨关系纳入符号学的视阈之中。比如,符号与所指对象和解释项之间的关系,符号的任意性与阐释可能性之间的关系,符指意义潜势与译作和译者创造之间的关系,符号转换中的多介质跨媒体合成与原符号文本之间的关系,作为语言游戏之生活形式的翻译与人类符号使用、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

(4)翻译符号学的方法观。一般翻译研究多采用学科的通用研究方法,如描写、对比分析、语料库统计分析、定量分析、归纳、解释、考证等,而翻译符号学把翻译视为符号的动态操作,涉及有形符号、无形符号的交替转换,认为符号的意义只在与系统中其他符号的互动过程中产生,所以它不仅要关照一般翻译学的研究方法,还要采用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如能指与所指、第一符号系统与第二符号系统、象似符-指示符-象征符、一级符号-二级符号-三级符号、存在意义-指称意义-实用意义等。

总之,一般翻译研究采用由内到外、以本体为主的路径,而翻译符号学以符号使用及其转换活动为对象,采用学科交叉、以符号为主的路径。翻译符号

学是针对翻译的宏观理论,具有阐释符号转换规律、总结符号转换特点、指导实践的作用。

任:国外翻译符号学的几位主要学者在研究路径上似乎都各有侧重。格雷(D. L. Gorfée)在其《符号学与翻译问题:以皮尔斯符号学为纲》中运用皮尔斯符号学对翻译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并提出了符号翻译(semiotranslation)这一概念;哈塔马-海诺宁(R. Hartama-Heinonen)在格雷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借鉴皮尔斯的溯因法(abduction),提出了溯因翻译(abductive translation);特鲁普(P. Torop)提倡的翻译符号学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紧密相关,多年来特鲁普一直对翻译符号学成为独立学科保持乐观;而佩特丽莉(S. Petrilli)的翻译符号学研究更大程度上受西比奥克全面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的影响,其研究对象很多时候被翻译研究者认为是翻译概念的比喻性使用。如何看待这些不同路径的翻译符号学研究,国内构建翻译符号学可以怎样吸收和借鉴,王老师能否给我们一些建议?

王:的确,西方一些学者也在从符号学的角度关注翻译问题。你提到的几位学者都在尝试从不同的路径来探讨符号学与翻译的关系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构建翻译符号学有重大启示。首先,他们的思想、观点以及取得的成果证明了翻译与符号学之间确有相通之处,翻译符号学有建立的可能性;再则,从符号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可以扩大传统翻译的疆域,逐渐将有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延至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及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范畴。

但从研究现状来看,我们对西方学者的研究还不能过于依赖,因为他们对翻译符号学的探讨仍停留在提出思想、观点和构想阶段,尚未对翻译符号学有明确的界定,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等问题也没有系统的论述。而且国外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不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似乎有空谈理论之嫌。即使是上述学者的有些观点和说法,也多有商榷的余地。比如,格雷虽然在三部著作中均提及符号翻译定义,但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皮尔斯的符号过程与翻译过程的概念,也并未将该符号翻译定义推进至逻辑清晰的三级范畴符号之中;格雷理论在语际翻译实践中阐释力不强;格雷试图建构的符号翻译更多关注符号本体内部的符码转换规律,忽视了符号本体外部的因素,诸如群体规范、文化制约及意识形态操控等对符号转换的影响。再比如,虽然特鲁普明确提出了“翻译符号学”概念,但他的研究对于符号学与翻译的关联度论证不够充分,因为符号学

除了可以解释翻译过程以外,还可以阐释任何形式的符指过程,所以特鲁普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符号学和翻译学的界限。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不同路径的翻译符号学研究?中国学者在构建翻译符号学时应该秉持的学术精神是什么呢?我的观点如下:

(1)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态度。无论是符号学还是翻译学,始终是西方学术界的贵宠,他们有许多思想和理论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在这方面我们做得不是多了而是不够。同时,我们要有自己的思想,一味的“西学东渐”是永远得不到应有的话语权的,我们要学会融合,更要勇于建立自己的翻译符号学观。“理论思维上的‘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不再能成立了。”(李幼蒸 2004:2)在全球化时代,各种人类知识都应按统一的学术框架加以重新整理与定位。

(2)对话与交锋的自立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翻译学处于各种理论的“分治”或“独白”状态,西方翻译学与中国传统翻译学自说自话。如何破除这一窘状,让中西翻译学展开对话,尤其要让中国传统翻译学精神成为世界翻译学共享的财富,同时在中西对话中建构共同的翻译学理论,恐怕目前我们的尝试——让符号学和翻译学交叉并构成翻译符号学新学科就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我想,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对话与交锋:一是“中国学术传统不仅是西学的重要‘异他者’,而且是其必要的对话者和补充者。”(同上:4)二是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翻译符号学一定要善于用我们自己的表现方式与现代符号学理论展开全面的思想交锋,在交锋中获得话语权,在交锋中求得自立;三是互动与互赢,翻译符号学的出现,一方面有助于西方符号学和翻译学理论的自我反省和调整,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国人文科学本身的现代化发展。

(3)探索意义的符号化过程。从卡西尔(E. Cassirer)开始,西方学者就将符号视为有生命的东西,甚至称符号学是一门生命科学。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意义的生命与活力,而符号学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科学(王铭玉 2016)。我们之所以要让翻译学与符号学交叉,就是想摒弃那种把翻译仅看作是语言互换的观点,使翻译上升到意义科学的高度,把翻译过程看作是有生命的符码转换的过程,把翻译符号化过程视为意义的生命过程。

(4)崇尚大翻译概念。构建翻译符号学的一个重大问题涉及研究本体的界定,故有必要从翻译现象涉及的符码转换本质角度,重新界定翻译所指的狭义与广义范畴。狭义翻译指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包

括一门语言内部及不同语言之间同时期与不同时期符号之间的转换;广义翻译则指广义符号之间的转换,包括语言符号转换为语言符号、语言符号转换为非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转换为语言符号,其中非语言符号又可以分为有形非语言符号(以物理形式为载体,比如体态语、面部表情、妆容等行为符号)和无形非语言符号(依托于非物理形式存在的思考、思辨、构思等行为符号)。因为翻译符号学是研究符码转换的学问,是研究符码意义之符号化过程的学问,所以其关注的对象应比传统的翻译学更广一些。换言之,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大翻译的概念,除了语际翻译仍然是其主要内容之外,还应关注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问题,建立一个适合于翻译符号学学科发展的域内、域际和超域三类译域范畴,凸显该学科的理论性、系统性、适用性和实用性。

任:国内学者从事翻译的符号学研究多集中运用社会符号学视角,研究对象多为语际翻译,以柯平、李明、王治江、佟颖等学者为主。从我手头有限的资料来看,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已完成四部符号学翻译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蒋晓华的《符号学翻译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造》(北京大学 2003)、李明的《翻译研究的社会符号学视角》(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5)、王治江的《社会符号学翻译初探》(南开大学 2007)和佟颖的《社会符号学与翻译基本问题研究》(黑龙江大学 2010),社会符号学明显占优。而事实上,早在 1984 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刊出奈达的《西方翻译研究方法》中,社会符号学就被作为三种主要的翻译研究途径之一加以介绍。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国的符号学翻译研究会出现这样的偏好?国内构建翻译符号学过程中,对这一传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王:客观地讲,符号学与翻译的交叉研究在我国开展得相对较晚,但发展得较快,关注的热度很高,尤其从社会符号学角度探讨翻译研究的更为热络。国内之所以出现这种偏好,从大的历史视角切入,我们会发现与多年封闭后的改革开放不无关系。国门初开各种新思潮不断涌入,符号学与翻译相结合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可谓是当时的热点,自然会引发大家的兴趣。从学术渊源角度看,1986 年,奈达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ng)中总结了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的优点,认为这种翻译研究方式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表达符号的指称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符号的象征意义。可以说,奈达是较早提出从社会符号学

角度研究翻译的人,换言之,可以把奈达作为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的提出者或倡导者。所以,在你上面提到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刊出奈达的《西方翻译研究方法》中,社会符号学被作为三种主要的翻译研究途径之一加以介绍就不足为奇了。

不可否认,西方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对我国翻译界的影响非常大,而奈达是影响我国翻译界的最重要学者之一。他从社会符号学切入,通过符号学的意义研究语言与翻译问题,在《翻译科学探索:关于圣经翻译中的原则与步骤》(*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中,他从符号学角度探讨《圣经》翻译问题,奠定了用符号过程考察翻译问题的社会符号学传统。自奈达提出社会符号学翻译法以来,国内很多学者或对该理论加以介绍,或运用该理论,从意义和功能对等的角度分析具体翻译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符号学翻译研究中社会符号学视角受到较多青睐的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社会符号学翻译研究途径确实具有很多优点:不仅强调语言符号系统内部的关系,还强调语言符号系统与其他文化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关注文本中语言符号的意义和功能的同时,也关注文本中非语言符号的意义和功能;既可以通过主体间性概念调和翻译主体之间的关系,又可以通过文本间性概念凸显意义的层级性。也就是说,人们从社会符号学视角容易切入翻译研究并找到各自的理论所需。

国内在构建翻译符号学过程中,对社会符号学这一传统视阈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我认为,首先应该鼓励和支持学者们继续对社会符号学翻译法作更深入的研究,同时要格外注意,也算是我个人对学界的一点建议,那就是不要去盲从西方翻译理论和思想,不要将重心仅仅放在引介社会符号学翻译思想上,而应该将重心放在理清社会符号学的发展脉络,为社会符号学寻根溯源,系统研究社会符号学本身,然后在此基础上,以社会符号学为指导,探讨翻译问题,以我国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为出发点,构建社会符号学翻译研究模式;再则,由于目前社会符号学尚未形成完善的系统理论,且现有的社会符号学翻译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大多为普通符号学概念,所以还不能称其为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我们认为,针对目前的实际状况,可以从该学科中被学界公认的一些概念入手,研究翻译问题,将其作为一种翻译研究途径和方法,最后我要重申,翻译符号学是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翻译,而符号学有很多分

支,如语言符号学、文化符号学、解析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等,每一个分支都可以作为一种翻译研究途径,各研究途径又不可能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翻译符号学是所有这些研究途径的综合体。

任:王老师,您认为国内翻译符号学如果要有所突破,今后一段时间主要应该在哪些方向努力?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王:一个学科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想当然的一蹴而就,需要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我认为,翻译符号学如果要有所突破应有以下几项工作要做:

(1)确定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传统的自然语言间的翻译,还是既包括语言翻译,又包括语内翻译、符际翻译,即上面所谈的“大翻译”视野。我想应是后者,要以符码转换为基点来探讨翻译。

(2)界定翻译符号学的概念。主要涉及翻译符号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厘清翻译符号学与一般翻译学(普通翻译学)、符号学翻译研究、符号翻译学及同样研究符号问题的语言符号学的区别。

(3)探索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研究翻译发生过程中符号转换涉及的符号过程、符号行为、符号关系、符号层级、符号间性、符号守恒、符号功能问题。

(4)确立翻译符号学的科学研究方法。除了已被翻译学、语言学等学科验证可以适用于翻译符号学的一些方法外,主要还是要用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如能指与所指、象似符-指示符-象征符、一级符号-二级符号-三级符号、存在意义-指称意义-实用意义等来进行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因为翻译符号学把翻译视为符号的动态操作,涉及有形符号、无形符号的交替转换,认为符号的意义只在与系统中其他符号的互动过程中产生。

(5)形成翻译符号学的术语体系。要用一套专门的关键术语来描写、阐释并规范学科,从而满足翻译符号学理论性、自治性、可操作性的需要。

(6)建立翻译符号学相关的文献资料库。搜集和翻译各国各语种写作的翻译与符号学联姻的相关著述,建立和健全翻译符号学资料库,可考虑择一所院校或几所院校在现有基础上建立翻译符号学资料中心。

(7)组建翻译符号学研究团队和机构。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常备研究人员,要开展适当的定期与不定期人员培训。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研究组织。

(8)创建翻译符号学专业会刊,或择选国内外专

业度较高、权威性强的期刊,开辟专栏发表翻译符号学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的交流(贾洪伟 2016)。

上述八大任务的完成需要循序渐进,而目前最为迫切的任务是要构建一个具有阐释和预见性质的翻译符号学理论构架和体系。我想这个体系应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具有宏观性质,探讨符号学和翻译发生的本质,论证翻译符号学建立的可能性,梳理国内外与翻译符号学相关的理论传统、主要观点、成果及研究现状,为建立翻译符号学提供学科知识基础;第二部分具有中观性质,探索翻译符号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涉及哲学观、研究目标与范围、理论基础、理论内涵、方法论原则等要素,旨在为翻译符号学的微观应用提供知识基础和理论支撑;第三部分具有微观性质,从翻译发生过程的符号转换机制和本质出发,以具体的文学文本(比如小说、散文和诗歌翻译等)和非文学文本(如《易经》、《老子》、马克思主义文献、歌剧、戏曲等)的译文为范,探讨翻译用于信息跨介质传输的元创作本质和过程;第四部分具有综合分析性质,回顾翻译史中涉及符号学的理论思想,从符号学角度重新梳理翻译史的发端与走向,凝练翻译符号学的精神价值,预见翻译符号

学的未来走向、发展及其中国翻译本土化的发展动向与特色(同上)。

相信,翻译如能进入符号学的视野,其学科内涵必能得到更大限度的解释,无论是翻译的本质、翻译的规律,还是翻译的模式均能得到进一步的探究。

注释:

① 这里所有有形符号和无形符号是以物理媒介为依托来界定的。有形符号是以物理媒介为载体的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类,并以语言符号为核心成员;无形符号不以物理媒介为依托,系思维、心智范畴内的活动,如思考、思辨、构思等。

参考文献:

- 哈特曼. 1981. 语言与语言学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贾洪伟. 2016. 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J]. 山东外语教学(3): 90-100.
李幼蒸. 2004. 中西符号学对话的意义和前景[J]. 国外社会科学(4): 2-6.
王铭玉. 2004. 从符号学看语言符号学[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 1-9.
王铭玉. 2015. 翻译符号学刍议[J]. 中国外语(3): 1, 22-23.
王铭玉. 2016. 中国符号学的理论依归和学术精神[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 64-66.
收稿日期: 2017-03-15
作者简介: 王铭玉,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语言符号学,翻译符号学。任伟,博士生,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符号学,翻译学。

(责任编辑 杨波)

(上接 17 页)

生态系统。因此,正如 Halliday(2003/2007:172)所说的,物种灭绝、污染及其类似问题并不只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所要关心的问题,也是应用语言学领域的问题。关心生态问题,这就是应用语言学研究者的一种“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 陈之荣. 2006. 人类圈·智慧圈·人类世[J]. 第四纪研究(26/5): 872-878.
黄国文. 2016. 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J]. 中国外语(5): 1, 9-13.
黄国文, 陈旸. 2016. 生态哲学与话语的生态分析[J]. 外国语文(6): 55-61.
李继宗, 袁闻. 1988. 论当代科学的生态学化[J]. 学术月刊(7): 45-51.
刘东生. 2003. 第四纪科学发展展望[J]. 第四纪研究(2): 165-175.
刘学, 张志强, 郑军卫, 赵纪东, 王立伟. 2014. 关于人类世问题研究的讨论[J]. 地球科学进展(5): 640-649.
赵剑波, 揭毅. 2008. 人类世地质学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42/4): 649-653.
赵蕊华, 黄国文. 2017. 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 黄国文教授访谈[J]. 当代外语研究(4): 8-12.

- Alexander, R. & A. Stibbe. 2014. From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to 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J]. *Language Sciences* (41): 104-110.
Crutzen, P. J. & E. F. Stoermer. 2000. The “anthropocene”[J]. *IGBP Newsletter* 41: 17-18.
Halliday, M. A. K. 2003/2007.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C]//J. Webster.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3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London: Continuum/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39-174.
Halliday, M. A. K. 2000. Applied linguistics as an evolving theme[C]//J. Webster. *Language and Education: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London: Continuum:1-19.
Naess, A. 1995. The shallow and the long range, deep ecology movement [C]//A. Drengson & Y. Inoue. *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 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 Berkeley, C.A.: North Atlantic Books: 3-10.
Stibbe, A. 2015.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M]. London: Routledge.

收稿时间: 2017-06-05

作者简介: 黄国文,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篇分析,翻译研究。肖家燕,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诗学,文学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 杨波)